安全理事会

23 June 2020
Chinese

2020年6月1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原件: 英文和法文]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召开的关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视频会议上特别顾问兼安全理事会第2379(2017)号决议所设调查组组长卡里姆·阿萨德·艾哈迈德·汗先生所作通报的副本。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COVID -19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 这些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尼古拉·德里维埃(签名)



附件1

特别顾问兼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组长卡里姆·阿萨德·艾哈迈德·汗的通报

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在安理会发言,介绍关于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工作的第四份报告(见S/2020/386)。

上周的6月10日是达伊沙占领摩苏尔六周年——六年前,他们滥用宣扬上帝统一的旗帜,在这座古城和受其邪恶控制的大片领土上散布不容忍、分裂和仇恨思想。

今年3月,我有幸通过一个例子亲眼看到真正的摩苏尔精神和伊拉克精神是如何在达伊沙留下的废墟中重现的。我在摩苏尔大学参加了一个小型社区活动。我被带到一个大厅,300多名当地社区成员听说我们会出席后聚集到了那里。我向这群人发表讲话,感谢他们出席,并表示现场有我们摩苏尔专门调查组的一名调查员,他在大厅的角落里。

我看着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走向我们的调查员,许多人在走近时从包里拿出文件和照片。人越聚越多,一个接一个站出来提供他们失踪家庭成员的细节、文件和照片,希望为调查组的工作出一份力,追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对他们丈夫、妻子和子女所犯罪行的责任。

那天我们离开大学时,带着200名愿意提供证据和站出来作陈述的人的详细资料,许多人为了提供姓名和讲述他们的苦难经历在天黑后等了几个小时。我们离开时,大学校长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凸显了调查组和我们大家在努力执行安理会规定的任务时担负的重大责任。他说:“这是希望。”

三月那天在摩苏尔大学明确展现出的对正义的渴望,每天都反映在我们与伊拉克各地幸存者和受影响家庭的接触中。国际社会通过第2379(2017)号决议承诺与伊拉克政府合作采取行动,让所有社区产生了希望和合理期望,即通过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审判中提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证据,伊黎伊斯兰国有可能受到追责。

在过去六个月中,调查组借助这种共同目标感和动能来应对这一时期的严峻挑战,其中当然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冠状病毒病这一最紧迫的挑战。我们的工作富有创造性、重点突出,确保调查工作的势头不会丧失。

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这段时间在确定新的证据材料来源和收集证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证据如果得到充分利用,有可能使起诉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在伊拉克所犯罪行的工作发生范式转变。

我们的进展仍然建立在两个关键支柱的基础上:符合国际专业的专业知识和调查组在伊拉克建立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我们与国家当局和各地地方当局的密切合作。创新和伙伴关系仍然是我们方法的基石,我们证据收集活动的主要进展反映了这一点。

通过与伊拉克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调查组从伊拉克手机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了200多万份与我们调查对辛贾尔雅兹迪社区所犯罪行有关的通话数据记录,也获得了有关调查达伊沙对提克里特手无寸铁的空军学员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通话数据。在调查重大罪行时已经用这一信息来确定相关人员的

地理位置。加上收集到的其他证据，我们将能够追溯到更多嫌疑人的行踪，在重大犯罪现场对事件进行确凿无疑的描绘。

在伊拉克司法机构的进一步支持下，我们还得到伊拉克手机服务提供商的同意，保留了2014年以来与我们调查相关的所有通话数据记录，从而保留了一个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罪行的潜在重要证据来源。

通过与国防部的合作，我们获得了从缴获的伊黎伊斯兰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中提取的大量数字证据。对这些数据的取证揭示了摩苏尔达伊沙的内部工作情况，包括内部行政基础设施、工资系统和详细记录其在调查所涉期间活动的视频。

我们在取证工作中，在伊拉克的主要犯罪现场、包括在辛贾尔和摩苏尔的乱葬坑使用三维激光扫描和建模，从而能够建立起虚拟现实框架，使幸存者和证人无论在巴格达、巴特拉还是柏林都能重新回忆起事件，向调查组提供详细的新证据。为了进一步增强受影响社区的权能，调查组还开发了一款移动报告应用程序，使受到伊黎伊斯兰国罪行影响的人能够安全地向调查组提供线索等信息，从而加强幸存者直接支持问责工作的能力。

这种技术创新精神还反映在联合国调查组最近实施的证据管理系统上。该系统由调查组内部的专家编程，响应了我们的活动以外勤地为主的特别需求，使调查人员能够安全地录入图片和地理定位，并且使用其移动设备进行数字签名。连同这些更新后的电子调查工具，调查组现在还能够迅速建立不同优先调查领域的物证之间的关联和模型，这为分析工作提供了便利，并且使我们能够迅速回应国家当局提出的问询。

基于这些进展，调查组推动多个调查分支的工作，进入证据整合与法律分析的阶段。

我们调查对辛贾尔的雅兹迪人所犯罪行的工作取得进展，导致查明16个主要犯罪现场的总计344名被控达伊沙施害人。从挖掘万人坑中收集的证据和幸存者、证人以及被羁押者提供的证词以及越来越多的数字和文件证据库为我们深入调查优先嫌疑犯的案情提供了佐证。

今天是提克里特空军学院未携带武器的学员和军人遭到大屠杀事件的六周年，我们对屠杀的调查得益于为调查这些罪行所设的国家司法委员会的广泛支持。现阶段我可以向安理会确认的是，调查组已查明可起诉达伊沙嫌疑分子的属于调查组授权范围的至少六类犯罪。

在调查摩苏尔所发生罪行方面，我们与伊拉克当局和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当局合作，于今年3月启动两处新万人坑的挖掘工作。这将是接下来数月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除这些了解案情的活动之外，调查组还优先编制综合卷宗，概述达伊沙对伊拉克各族裔所犯罪行的法律特点。在这方面，我打算在我下次通报时，向安理会提供综合的评估意见。

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在我们当前调查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调查组还得以扩大其调查战略，处理达伊沙对伊拉克各族裔、包括对基督徒、卡卡埃人、沙巴克人、逊尼派以及土库曼族所犯的罪行。新设立的两个实地调查股为我们工作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支持，由此我们将兑现承诺，确保在我们的调查中不对受害者划分等级。

自我近两年前接受任命以来,我一再强调,伊拉克政府应当为其远见、合作精神以及它请求安理会设立本调查组所表现出的司法承诺而受到赞扬。它们的坚定支持表现在国家当局与我们在伊拉克境内的调查人员、法证专家以及安保团队广泛协作,我继续为此深受鼓舞。我相信,在穆斯塔法·卡迪米总理及其内阁得到确认后,这种合作精神将继续推动、实际上是加快我们的集体进展。在我今天早些时候与福阿德·侯赛因外长的对话中,我欣见我们的讨论表明,我们对于如何能够通过我们为伊拉克政府提供帮助来伸张正义有着一致的看法。

伊拉克政府任命的国家协调委员会给予的伙伴合作对于实现我上次通报以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至关重要,即:根据我们的职权范围,任命调查组初始的国家刑法专家小组。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工作应对伊拉克国内刑法框架的具体要求,并且反映出伊拉克全国各族裔的需求。

与国家协调委员会的合作对于落实调查组今年3月启动的一个证据数字化的重大项目也举足轻重。我们将通过该项目,支持国家当局和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当局把数以万计的与伊黎伊斯兰国犯罪有关的卷宗、文件和数字物证数字化。

我还一直感谢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天上午,我高兴地与库尔德斯坦地区总统通了话,他强调他本人承诺,确保各地区当局继续全力支持调查组的工作。

当然,第2379 (2017)号决议对幸存者许下的诺言不会仅通过收集和保存证据得到实现。尽管这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仅靠我们创建文档,留下伊黎伊斯兰国对伊拉克民众所犯罪行的历史记录,这是不够的。只有当正义在法院得到伸张,当伊黎伊斯兰国暴行的幸存者能够看到凭借无可争议的、采集符合国际标准的证据而依法追究其施暴者的责任时,我们对伊拉克各族裔的承诺才会得到落实。

正是抱着这种共同的承诺,我继续与伊拉克政府一道努力加强渠道,籍此使调查组收集的证据可被用作伸张正义的依据。为此,今年4月我高兴地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一项战略文件,以一种符合调查组职权范围的方式,勾画出在伊拉克境内审判伊黎伊斯兰国成员所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者灭绝种族罪的道路。

我最近与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先生、首席大法官Faiq Zidan以及伊拉克政府高层人员的会面令我深受鼓舞,他们在这些会议中强调,继续支持通过由总统倡议提出、目前正由国民议会进行审议的法律,这部法律将准许在伊拉克境内起诉这些罪行。

正如在我的报告中所反映出的那样,我们还继续积极地与全球多国当局接触,以加大当前在其它会员国调查和起诉工作的力度。

我报告中所述及的合作精神还继续扩展至我们与伊拉克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我尤其把与宗教领袖和行为体一道努力追究责任以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作为优先事项。最近几个月,我在与天主教、东正教、什叶派、逊尼派和雅兹迪教的领袖会面时均强调,我致力于同他们的社群密切合作,以确保伊黎伊斯兰国对它们犯下的罪行得到适当调查,并确保那些负有责任的人被绳之以法。

因此,今年3月,我高兴地与阿达马·迪昂副秘书长一道,欢迎有关各方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宗教间声明》。通过这一历史性步骤,伊拉克各大宗教的领袖走到一起,共同谴责伊黎伊斯兰国违反所有宗教原则的行径,并强调他们将一道致力于确保那些负有责任的人被国家法院追究责任。

我特别感到鼓舞的是,伊拉克宗教领袖通过该声明共同呼吁采取行动,确保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幸存者以及受伊黎伊斯兰国罪行危害的儿童不会因其经历而蒙受污名,而且还强调他们一致支持调查组根据安理会规定的任务授权开展工作。我期待在今后几个月中增强该声明所形成的势头,以加强为伊拉克各社群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体现我们让各社群和利益攸关方参与我们工作的承诺,我高兴地在本月早些时候与伊拉克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主办了几场圆桌讨论会,共有50多个组织参加。我本人对这些讨论会的积极性质和成果感到欣慰,并强调了我的承诺,即这些会议将成为以定期对话论坛的形式与非政府组织和幸存者团体进行更广泛的持续对话的起点。

请允许我在今天发言的最后再次提及今年3月在摩苏尔大学为了与我们小组对话而等到深夜的学生、家属、教师和其他社群成员的乐观态度和期望。那天晚上院长这样说道:“这就是希望”。我请大家思考一下这句话中所蕴含的鼓励和深深的责任感。

在我们抵达伊拉克后的20个月里,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最近在寻找和利用新的证据来源方面取得突破,为我们兑现对这些社群的承诺扫清了道路。我还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对调查组的支持——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提供专业人员,此种支持对于维持我们的工作仍将不可或缺。

但是,我们绝不能允许我们的目标发生偏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像摩苏尔、巴格达、辛贾尔、尼尼微平原和伊拉克其他地方的幸存者所要求的那样紧急采取行动。调查组目前正努力与伊拉克当局合作,恢复实地调查,正是所有幸存者这种充满勇气的希望和合理的期待将继续激励我们前进。